

张明华 著

《新五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五代史》研究

张明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五代史》研究/张明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004-6440-2

I. 新… II. 张… III. ①中国—古代史—五代(907~960)—纪传体②新五代史—研究 IV. K243.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502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沂 涟

责任校对 刘 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张明华，女，1965年4月生，开封市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198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获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开封师专和河南大学历史系执教，主讲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研究方向为宋代史料学、史学史。曾在《史学月刊》《河南大学学报》《史学史研究》《文史知识》等杂志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本书出版承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经费资助

前 言

一 问题的提出

自《新五代史》问世后，人们即开始将其与《旧五代史》进行比较，批评者少，赞美者多，就当时而言，仅有吴缜的《五代史纂误》从史实的角度对其提出批评。这固然与欧阳修一代文宗的社会地位和名臣的知名度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新五代史》价值判断标准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日益合拍。严格意义上讲，从学术角度研究《新五代史》，应始于清代馆阁大臣整理《四库全书》时对其的评价，以及在乾嘉史学影响下清代考史三大家对其著述宗旨、体例、内容、史料价值诸方面的分析。其后，所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都毫无例外地对其进行了介绍。^①对《新五代史》的研究在某些领域也取得了局部的突破，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尚未有整体性的突破，这种研究现状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仓修良：《中国古代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等。

2 《新五代史》研究

与《新五代史》在中国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极不相称。

笔者认为,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治中国史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整个中国史学史发展走向的把握之上,没有对《新五代史》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二、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没有新的突破。因此,其结论只能是人云亦云,简单肤浅,给人以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在众多有关欧阳修的整体研究中,传记居多,作为欧阳修学术成就的一部分,《新五代史》也拥有其一席之地,正是因为“一部分”的地位,作者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对于《新五代史》的介绍大多也沿袭了前人之说。^①在此,我们无意责备这些整体研究欧阳修的学者,但作为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应该从这些翻来覆去的陈旧结论中感到危机,要改变目前学界这种人云亦云的现状,必须对《新五代史》进行专门性研究,否则,我们既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新五代史》,也无法真正填补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对宋代历史学影响的空白。基于以上原因,笔者选择这一题目作为博士生学习阶段的研究对象。无独有偶,2005年5月,本论文完成并通过毕业答辩,2006年5月,戴仁柱(Richard Davis)先生发表的《〈新五代

^① 欧阳修传记著作:洪本健:《醉翁的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黄进德、郭璇珠:《欧阳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德清:《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刘德清:《欧阳修传》,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版;刘德清:《欧阳修》,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卢家明:《欧阳修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台湾学者的专著有:刘若愚:《欧阳修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美国学者有: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4年版。

史》英文版序言》一文提出了许多与笔者相似的观点。^①

北宋前期，学统无归，至北宋中期，又学统四起，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宋学。宋学又称“义理之学”，宋儒们对儒家经典所进行的大胆怀疑，体现在宋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以修史为例，宋人所修的三部正史中，其中《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对前朝史书的修正，而这一修正恰恰是北宋儒者政治价值取向、学术观念转变在史学中的反映。欧阳修不仅参与了两书的修撰，而且在《新唐书》《新五代史》的修撰中分别担任了监修和独撰的重要角色，而最能反映其史学思想者是《新五代史》，因此，《新五代史》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宋学在史学领域的最早反映。对《新五代史》的研究不能仅着眼于它所记录的五代历史的内容，而是要结合该书产生的大的社会学术环境，看到《新五代史》在史学义理化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就宋代学术史而言，《新五代史》的研究又是宋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部分。该课题无论对史学史还是对宋代学术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新五代史》撰写时间早于《新唐书》，而其成书时间却晚于《新唐书》，这两种史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呢？与《旧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的体例、内容、价值判断上究竟有哪些不同？此为问题一。

历时九百余年，人们对《新五代史》的评价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为什么这部在北宋中期产生、以褒贬宗旨撰写的史书能够得到自宋至元明清所有统治者的一致首肯，时至今日，《新五代史》的一些篇章和史论依然为我们津津乐道，成为我们抨击世风、针砭时弊的论据？由于五代历史及《新五代史》撰

^① [美] 戴仁柱著，马佳译：《〈新五代史〉英文版序言》，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 《新五代史》研究

写的特殊背景使其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2004年,由美国宋史学者戴仁柱先生完成的《新五代史》英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西方中国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评价该译作“值得推崇”,为西方学者“研究唐宋转型和11世纪中国新文士意识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耶鲁大学韩森教授也称赞该书的翻译为“日益认识到宋代前50年间”历史重要性的西方史家拓展研究的“门径”。除《一行传》、《司天考》、《十国世家年谱》各1卷以及《四夷·附录》3卷外,戴仁柱先生译出了74卷中的67卷,其中《本纪》12卷、《世家》10卷、《家人传》8卷,另外还将“充分体现儒家伦理思想并贯穿全书的原作史评以及大部分人物列传完整译出”,译者同时将原著的注文全部译出,并就史书体例和其多年的研究成果做出了200条注释。^①回眸历史,《新五代史》究竟给人们提供了怎样的思想内涵,使其作为唐宋社会转型和士大夫们新的价值观念崛起的风向标而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具有如此经久不衰、旺盛的生命力?此为问题二。

宋代官私史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又为史学的传播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手段,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表现在哪里?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从《新五代史》中能够悟出什么?一部优秀史书的标准是什么?丰富的史料、严谨的体例、优美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其关系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还是缺一不可?此为问题三。

尽管目前尚未有比较完整的《新五代史》研究专著以供参考,但笔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并非白手起家,感受前辈的启迪,聆

^① 王宏杰:《文理宜然——〈新五代史〉英译本评介》,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听大家的教诲，汇聚学者们对《新五代史》的研究成果，站在众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这些都是笔者敢于承担这一课题的坚实学术背景。

二 研究成果回顾

（一）体例和内容

体例和内容一直是人们褒贬《新五代史》的重点，人们对其评价始终有一参照物相伴，即《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尚在编纂之际，人们就对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与欧阳修保持密切联系的梅尧臣和刘敞盛赞《新五代史》的春秋笔法，^①而刘攽因《新五代史》没有替韩通作传，认为欧阳修没有秉承《春秋》“善恶必书”的直书精神，只能算“第二等文字”。^②《新五代史》问世以后，受到人们角度不同的审视，作为欧阳修的亲人，欧阳发评价《新五代史》“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其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且“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③欧阳发的说法为宋人评价《新五代史》定下了基调，不仅欧阳修的弟子门人沿袭此说，^④官方观点也与其基本一致：吴充在

①（宋）梅尧臣：《宛陵集》卷二六，《寄滁州欧阳永叔》，第10页；（宋）刘敞：《公是集》卷九《观永叔五代史》，第42页。

②（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第234页。

③（宋）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二》，第2628页。

④（宋）苏辙：《苏辙集·栎城后集》卷二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第1135—1136页。“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陈师锡：《五代史·序》“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而（司马）迁（班）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论朋党、宦、女、忠孝两全、义子、降、服，岂小补哉！岂小补哉！”

6 《新五代史》研究

熙宁六年（1073）七月作《行状》，“其为纪，一用《春秋》法。……《五代史》辞约而事备，及正前史之失为多”；^①《神宗实录本传·墨本》赞《新五代史》“叙事不愧刘向、班固也”；^②《四朝国史·本传》认为欧阳修所修史书“法严辞约，多取《春秋》遗旨，殆与《史》《汉》相上下”^③。王辟之在比较新旧《五代史》和尹洙的《五代春秋》后，认为《新五代史》“文约而事详，褒贬去取，得《春秋》之法，迁、固之流”；^④可见对《新五代史》的赞誉占据了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主流。

与此同时，政治家兼学者王安石认为《新五代史》“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最高统治者宋神宗却给予《新五代史》高度评价，“责以义，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事皆可嗟叹也”。^⑤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关五代史处理上对《新五代史》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于史事多不取《新五代史》，而用《旧五代史》，^⑥在人物评价上则接近欧阳修，于无声处，表明了对《新五代史》的看法。学者吴缜不畏欧阳修的学术地位和名气，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用本校的方法列举出《新五代史》史实记载方面的200条错误，直截了当地指出《新五代史》记事的准确性不及《旧五代史》。^⑦

值得注意的是《新五代史》问世以后，传到辽金所引起的

①（宋）吴充：《行状》，《欧阳修全集·附录三》，第2698页。

②（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三，《神宗实录本传·墨本》，第2660页。

③《欧阳修全集》，附录三，《四朝国史·本传》，第2681页。

④（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六，第70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六三，神宗熙宁八年闰四月丁未条，第6441—6442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4页。“五代旧史，温公《通鉴》用之，欧公盖以此作文，因有失实。”

⑦（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第201页。

不同反应，寿昌二年（1096），辽国史馆修撰刘辉上书辽道宗：“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枉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① 泰和七年（1207），金章宗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只用欧阳修所撰”，^② 确立了《新五代史》的官学地位。其实早在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建议朝廷罢诗赋，以诸经、子、史、时务科举取士时，即提出“诸史”中“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③ 在此，新旧《唐书》被分别列出，而五代史书也有新旧《五代史》之别，此处只有《五代史》应是特指，张元济先生指出：“南朝先已摒弃《薛史》，北朝文化自知不逮，故起而从其后”，^④ 可见此《五代史》乃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在南宋、金的统治区域确立了官学地位后，《旧五代史》虽未禁绝，但由于其功利和实用功能的丧失，导致了《旧五代史》社会需求量的减少，其刊刻、流布受到明显的限制。历经元明，《新五代史》的官学地位日趋稳定，而《旧五代史》备遭冷落，元明以降，“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到明朝修《永乐大典》时，“虽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⑤ 清修《四库全书》时，已找不到原书，目前我们看到和使用的《旧五代史》是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从《永乐大典》等书辑佚而成，大致只恢复了原书的十分之七八。在考据学占据主流的乾嘉学风下，四库馆臣对《新五代

① （元）脱脱：《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第1455—1456页。

② （元）脱脱：《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纪四》，第282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第3634页。

④ 张元济：百衲本《〈旧五代史〉跋》。

⑤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旧五代史》，第411页。

史》的义例、文笔、事实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对事实则不甚经意”，并以《春秋》三传为例形容新旧《五代史》的关系，“欧史如公（羊）穀（梁）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①“对事实则不甚经意”、“传闻多谬”的评语对于一部史书来讲可谓是最严厉的批评，言外之意即《旧五代史》为《左传》，而《新五代史》如公羊、穀梁，两者虽然并存，但《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远不及《旧五代史》。

在比较的基础上，清初考据三大家对《新五代史》的学术价值提出严肃质疑：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重点对《新五代史》的史料进行分析，澄清了《新五代史》在记事方面的一些失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对五代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归纳的同时，对新旧《五代史》在取材、体例、笔法、失检处等首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得出与四库馆臣相似的结论。^②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其刻意模仿春秋笔法的做法颇有微词，批评欧阳修所用的春秋笔法已经产生了以文害义的不良影响。^③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新五代史》的批评更加激烈，贬抑《新五代史》“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五代史》，第411页。

②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一，第451页。“（《旧五代史》）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

③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第1058—1059页。“梁唐晋汉周仍各自为一书，极是”，“（《新五代史》体例）乍观之，壁垒一新，五花八门。徐思之，五代各自为代，乃错综记载，若合为一代者然，此何说乎”；“《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一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征。”

集”、^① 欧阳修毫无史才可言，但同时也承认，“其（《新五代史》）有佳处，则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司马迁）班（固）以来所不能及”。^②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梁启超先生结合西方史学理论，倡导新史学，对《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提出批评，^③ 在反对欧阳修刻意模仿“春秋笔法”的同时，依然称赞欧阳修是一个“发愤为雄”^④ 的史家。金毓黻先生指出《新五代史》于史料的简略外，还指出“其（《新五代史》）所见史材，实远过于宋初，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颇能多所订补，于五代末季及十国事并四夷附录，尤能增入新史实，为薛史不及”。^⑤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称赞《新五代史》所作义儿、冯道等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⑥ 台湾学者林瑞翰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对《新五代史》的书法（笔法）、记事、考史、史源进行了考察，遗憾的是林先生没有把这些琐碎的考证结果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⑦ 顾永新先生撰文重申欧阳修编纂史书时有存在《春秋》笔法，褒贬义类；文约事丰，简而有法；不没其实，据事

① （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一，《信摭》第 21 页。

② 《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第 39—40 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第 55 页。“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厝意也。”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 325 页。

⑤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8—199 页。

⑥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收入《寒柳堂集》，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162 页。

⑦ 林瑞翰：《欧阳修五代史记之研究》，载（台湾）《宋史研究集》第 10 辑。

直书的三大特点，但笔者认为此中不少结论值得商榷。^①

今人研究《新五代史》的义例、内容，大多重复归纳前人之说，而无实质性的拓展，经不起仔细追问和推敲，欧阳修在史书体例方面究竟有哪些创新？《新五代史》体例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新旧《五代史》相较其记载内容有哪些出入？《新五代史》究竟增加了什么内容、删削了哪些内容、增删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二）《新五代史》的影响

《新五代史》问世以后，对宋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宋代史学与前代的明显差别，在于由传统的资治、借鉴的叙事史学派生出了旨在“明道”的义理史学。宋代义理化史学对两宋、元、明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清代乾嘉学派兴起后，治史之风才发生转变。义理派史学起自何人、何书？虽然目前学界的部分学者提出义理派史学始自《新五代史》，如学者蔡崇榜确认为始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② 钱茂伟先生也认为“《新五代史》表现出来的理学化史学”（从作者所列举的《新五代史》“一是尊王，一是用纲常标准论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特点看，笔者认为虽作者称然其为“理学化史学”，但内容实属于义理史学的前期），^③ 罗炳良先生对宋代义理化史学的

① 顾永新：《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载《文史哲》2003年第5期。

② 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1988年。“自宋初到宋仁宗朝或稍晚为前期，其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和承袭中唐以来的史学风气，注重模仿《春秋》义例，以褒善贬恶作为修史的根本目的，代表作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及欧氏与宋祁等编撰的《新唐书》；从宋神宗以降是为后期，特点是受理学思想影响，史学逐步理学化，成为儒家经学的注脚，代表作即范祖禹的《唐鉴》、胡寅的《读史管见》和朱熹的《通鉴纲目》。”

③ 钱茂伟：《范型嬗变的宋代史学》，收入《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第228页。

讨论也是从《新五代史》开始的。^①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义理史学者甚多,但学者们在谈及义理史学时多是从《唐鉴》入手,有的直接从南宋入手,^②割裂了《新五代史》与其他史籍在义理化史学形成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新五代史》的系统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研究的薄弱处。

1965年,柴德赓先生撰文指出《新五代史》长期独霸学术地位对后人认识五代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即:欧阳修贬低五代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宋代,《新五代史》对十国政权的记载与十国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极不相称,“五代历史总是前进的,要认识五代这个时代,不能只看军阀混战那种漆黑一团的情况,而要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虑”,《新五代史》长期独享盛名、独霸学术的主要原因是欧史比薛史更能为封建统治服务,更符合封建地主政权的需要。^③柴先生首次打破从体例、史料、笔法等方面评价《新五代史》的局限,将人们对五代历史的认识与《新五代史》联系起来,可谓高屋建瓴。随着唐宋之际社会变革观点的传入,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五代和十国割据政权的历史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但以上成果无论是对唐宋之际政治、经济等制度性的变革还是由此引

① 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② 刘连开:《南宋中期的史论与史学哲理化趋势》(博士论文);范立舟:《宋代理学与中国古代历史观》(博士论文),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

③ 柴德赓:《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收入《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沈起炜:《五代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卞孝萱、郑学檬:《五代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起的社会形态、文化及世人变化的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其根源均在于欧阳修对五代历史的贬抑及《新五代史》对后世的影响。

（三）《新五代史》的史学思想

白寿彝先生曾指出：“他（欧阳修）的历史思想比司马光的要丰富些。”^① 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确实博大精深，堪与其一代文宗的学术地位媲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既包括“春秋学”“尊王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也包括其重人事反对天命的哲学思想，还有其继承韩学、弘扬儒家道统、排斥佛道及各种迷信的进步思想等，这些思想贯穿于《新五代史》的体例安排、史料取舍、内容选择和史论等方方面面，了解欧阳修的经学思想是研究《新五代史》的关键。

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过程中，欧阳修在经学方面颇有建树，甚至被称为宋代疑经第一人，^② 其经学思想尤其是“春秋学”思想在《新五代史》中的反映早在 80 年代即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他们研究《新五代史》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1980 年，姚瀛艇先生就提出欧阳修希望通过《新五代史》申述其报效朝廷之心，在《新五代史》中表现了重人事、整伦常、纳直言、任贤臣等治乱兴衰之理。该文虽然没有明确《新五代史》与“春秋学”的关系，但把《新五代史》的著述思想与《春秋》提倡的伦理纲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③ 1981 年，姚先生再度撰文，明确指出《新五代史》“褒贬善恶”的义例刻意模仿《春秋》，欧阳修用这些义例对五代人物、事件进行褒贬美刺，尽情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叙篇》，第 70 页。

② 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编第六章，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9 页。

③ 姚瀛艇：《欧阳修的史论》，载《河南师大学报》1980 年第 2 期。